

第一位进入陕北红区的女作家

□ 柏 峰

1936年9月，丁玲从上海登上西行的列车，到达西安，决心投奔陕北红色根据地，寻找一个革命作家的精神归宿。11月1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丁玲经过三原、耀县、宜君、洛川，沿着洛河北上，一路艰苦跋涉，到达保安。

丁玲到达保安后，进入洛河流域的红色根据地，受到了党的隆重欢迎。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孔窑洞里举行了一个欢迎会。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凯丰、林伯渠、李克农等三十余人出席了欢迎会。丁玲走进会场时，周恩来热情招呼她：“欢迎我们党的好女儿回到家里来！”蒋祖林在《丁玲传》里，这样描写道：

丁玲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到家了，真的到家了！欢迎会上，亲密、和谐的气氛更加深了她的这种感觉。她感到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幸福、最荣光的时刻，在这孔窑洞里，她几乎见到了所有党中央的领导人，她应邀在会上讲话。丁玲无所顾虑，满怀欢乐，第一次在这么多领导人面前讲话。她讲了她的追求与向往，讲了她从事文学后的奋进，讲了她被困南京三年的斗争，讲了她初到苏区的感受，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地喋喋不休地饶舌。

丁玲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走进了一种新生活，全然不同她以前曾经生活过的那个世界，她觉得一切都都很新鲜。在这里，人们全都充满着革命的激情，洋溢着快乐的青春的活力。在这生意盎然的气氛中，丁玲既感到欢快，也受到鼓舞。

进入陕北红区，丁玲完全沉浸在投入母亲怀抱的那种幸福的情绪中。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她也思考着红色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她认为，应该把红色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如同在上海那样成立一个左联一样的文艺组织，这对促进整个中国的革命文艺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因此，丁玲向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谈了成立一个文艺团体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并初步定名为“文艺工作者协会”。随后，发布了“文艺工作者协会缘起”，发起人有丁玲、成仿吾、伍修权、李伯钊、徐特立、李克农、陆定一等三十四人。1936年11月22日，举行了陕北红色根据地第一个文艺团体成立大会。会上，大家讨论这个团体的名称，毛主席提出叫“中国文艺协会”，被一致通过。

丁玲担任了协会主任，立即着手调查会员登记，通知各地各军队

成立分会，拟定研究计划等，同时在《红色中华》报上创办《红中副刊》。她在《红中副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刊尾随笔》，作为代发刊词，写道：

有人说一支笔可以生死人命，我们也可以说一支笔是战斗的武器……我们要从各方面使用笔，用各种形式，那些最被人欢迎的诗词、图画、故事等等，去打进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争取他们站在一条阵线上，一条争取民族解放抗日的统一战线上。

毛主席在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大会上的讲演里明确了协会的任务。从此，把文艺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把文艺与伟大的民族解放联系起来，成为丁玲在洛河流域文学创作的鲜明主题。党中央批准了丁玲当红军上前线的要求，丁玲跟随杨尚昆领导的红军前方总政治部北上定边。

北上定边的旅途对丁玲来说，无疑是一次生活的深刻体验与人生历练，全然不同于城市的生活艰苦而新鲜的陕北风光，丁玲很快就写出了散文《到前线去》，她描写当时在洛河岸边的行军：

开始两天全跟着洛川河走，一时间又爬到两边的悬崖上，这些路都非常险峻，牲口不能上去，得远远绕着河的对面，岩底下的小路走。大半时候还有许多烂泥，一些被太阳晒溶了的地方。后来的行程，便转到山上了，越过了一岭，又有一岭，几十里，几十里看不到一个村庄。这些山都无树木，枯黄的荒草，或是连草也看不到的那么无际的起伏着，一直延展到天尽头，但这天是无尽头的，因为等你一走到尽头的山上，你又看见依旧是那一幅单纯的图画铺在你脚下了。这些地方有着一些奇怪的地名，但随即就会忘去的。

实际上，丁玲他们进入了黄土高原上的白于山脉，沿着洛河走向定边，她的感觉确实不错，笔下洛河岸边的景物也描述得很真切。如果没有走过这条山道，肯定写不出这样准确的行程感受。说真的，时间已经过去八十多年，我自己驱车沿着白于山洛河岸边的省级公路行走，还不时有类似丁玲当年的感受，尤其是她说的“一些奇怪的地名”，也是常常遇到。虽然有村名的标识牌高高竖立在路边，却不认识标识牌上的汉字。这些冷僻的字，常常过后就忘记了——到底是大作家，丁玲的艺术感觉很敏锐，文字表达准确——经过几天连续行军，他们到达目的地——定边县城外的绍沟沿——红军前方总司令部

就驻扎在这里的小村庄。在绍沟沿，丁玲见到了红军前方总司令部的彭德怀司令员和任弼时政委。

这里靠近沙漠，朔风刺骨寒，满目荒凉，生活极端艰苦，丁玲并不以为苦，愉快地感到到处都是勃勃生机。在《怀念成仿吾同志》里，丁玲笔下的白于山脉和定边风物却是那样的优美而令人愉悦：

这天，太阳从东边地平线冒出来的时候，我在一群新集合起来的一伙人中间，策马东行。空气很冷，很新鲜，路很平，塬上极少树棵，偶尔看见几棵长不大的杨树，满天红霞，不是灿烂如锦似火，倒似从冰霜中冷冻过的那样浮着一层既淡又薄的雾似的轻纱，笼罩大地，含着一种并不强烈的淡淡的温柔，却很能稳定我容易激动的心情。我极目寰宇，悠然自得，脑子里浮现出古代的诗歌，那些印证着此情此景的诗句，是多么豪迈和使人舒坦！这里是冬日，又似霜晨；是征程，又似遨游；是战士，又似游子……蹄声得得，风沙扑面，我如在梦中，如在画中，只是从同志们那里传来的欢声笑语，才使我想到我是在哪里，正向哪里去！

这段包含着诗意的语言，表达出丁玲舒畅而高兴的心情，也描写出洛河流域白于山脉独特的冬天的优美景致——真是应了一句话，一切景语皆是情语。人的心情喜悦了，眼里尽是好风景，丁玲此时就是这样的心情，所以其散文作品也跳荡着激动不已的情绪和一切美好的景致。在定边，她参加了纪念广州暴动九周年的群众大会，会后，写有《广暴纪念在定边》，发表在《红中副刊》第二期上。

丁玲不但观察周围的山川树木以及起伏不已的山脉，更多是观察和深入了解红军战士和红军将领。此时，丁玲对彭德怀观察得那样细致，彭德怀的一言一行她都看在眼里。她在随军南下途中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沿途都没有休息，只要一休息下来，便又拟着电稿或指示的彭德怀同志又已坐在人来人往的门边写着什么了。”“忽然从门外传来一个有力的声音，使大家都肃静地听着，这正是那坐在门槛上写东西的前敌总指挥。”“我同着指挥部一块儿行军，有三天了，我还没有看见他有一分钟是想着别的。”“11点了，我还坐在火边，借火光写着日记，炕上已响起鼾声……只有机要科不时送来一些电报给总指挥和政委，而这些电报，也是我每晚要看的。”她的著名散文篇章《彭德怀速写》，生动地刻画出彭大将军的个性与神态：

下了光辉的一页。

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后任军团长。他先后率部参加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战斗，屡立战功，曾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红旗勋章。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董振堂率部参加长征，红5军团担任最艰苦的后卫任务，多次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战功，红5军团因此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第5军团改称第5军，董振堂任军长。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红5军被编入西路军，向宁夏、甘肃、新疆方向进发。1937年1月12日，董振堂率部在甘肃高台县城与六七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战，战至最后一人一弹，于20日壮烈牺牲。时年42岁。

董振堂是红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党中央在陕西宝塔山下举行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评价他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摘自2021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他的脸色是看不清的，因为常常有许多被寒风吹裂的小口布满着，但在这不算漂亮的脸上有两个黑的、活泼的眼珠转动，看得见有在他那成人脸上找不到的天真的顽皮……昂扬的心都会在他那种最自然诚恳的握手里显得温柔起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彭德怀率红军主力开赴庆阳、西峰一带，而后又南下至咸阳、三原、淳化。丁玲亦随总指挥部南下。就此，丁玲离开了定边，离开了洛河流域。在洛河流域，她还创作《保安行》七八篇作品，其中有《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等篇章，后来，丁玲收集整理成《北上》《南下》等作品，准备出版，因为战事紧张搁置起来——虽然，丁玲在保安、在洛河流域的这段时间并不算长，在党的关怀下、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却是她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起点、一个转折，也是她文学艺术风格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为今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坚定了文学为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服务的正确的文学创作方向。因此，在保安，在洛河流域的丁玲的文学活动与创作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

就在丁玲跟随红军主力南下到达庆阳的时候，收到毛主席用军事电报发来赠送她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舅，今日武将军。

这首词充分表达了毛主席对第一位进入陕北红区的女作家丁玲的高度评价和极高期望。正是从革命需要的角度，毛主席把文艺抗战所能起的作用看作同军事力量的增长同等重要。毛主席一生创作的诗词中，题目中写明“给某同志”的，只有《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和这篇《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而已，而这两首诗词，都是在洛河流域的保安写的，弥足珍贵。

（摘自2022年9月30日《光明日报》，原标题为《第一位进入陕北红区的女作家——丁玲在洛河流域的文学活动与写作》）



1955年至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有1614名高级将领被授予将军军衔。其中湖北红安、安徽金寨、江西兴国、湖南平江、江西吉安、江西永新、河南新县、湖北大悟、安徽六安、湖南浏阳等10个县，因将军数量众多而被称为“将军县”。

在全国十大将军县中，安徽金寨、河南新县、湖北大悟这3个县彼此间有着深厚的渊源，它们同属大别山区。大别山，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地区，是我党的重要建党基地、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

此外，这3个县都是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对鄂豫皖边界地区的反动统治而新增设的县份。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蒋介石本想采取“增设县治、分而治之”的方法来加强他的反动统治，未承想新增的3个县不仅没有发挥作用，反而后来都成了赫赫有名的将军县。

改名“金寨县”，历史面目真。1932年以前没有金寨县，那时只有一个名叫金家寨的小镇。以金家寨为中心的金寨地区位于大别山腹地，这里马克思主义传播早、党的组织建立早、革命武装起义早、红军队伍诞生早、革命根据地形成早。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严重地影响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于是，蒋介石就调集大批部队对金家寨等地进行多次“围剿”，前3次均以失败而告终。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30万重兵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为破解困局，蒋介石还公开许诺：谁的部队最先攻下金家寨，就以谁的名字命名设立一个新的县。9月20日，国民党军卫立煌部进占金家寨。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兑现战前许诺，以金家寨为中心，打破鄂豫皖三省界线，将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及河南省的固始、商城等县的交界地带，各划出一部分增设一个新的县，并以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27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9月2日，第3纵队8旅解放了立煌县城，3日解放了流波、麻埠。县委、县民主政府组建后，决定将立煌县改名为金寨县。县长白涛亲自撰写布告、张贴全县：“查我金家寨，大别山中心，革命根据地，中外有威名……改名金寨县，历史面目真……”从此，金寨这个县名载入史册。

金寨县现为安徽省六安市管辖，是仅次于湖北省红安县的全国第二大“将军县”，从这里走出了上将洪学智，中将皮定均、李耀、张贤约、陈先瑞、林维先、徐立清、曾绍山、滕海清，以及少将50位。

人民做主人，“经扶”换新称。1932年10月，在卫立煌部占领金家寨后，国民党“围剿军”中路军刘峙部占领河南省光山县南部重镇新集。新集是鄂豫皖苏区首府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将河南省光山县和湖北省麻城、黄安等县的交界地带，各划出一部分增设一个新的县，并以刘峙的字取名为“经扶县”。

1947年8月28日，刘邓大军一部击败了盘踞在经扶县境内的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12月，经扶县首届人民政府代表大会召开。会上，代表们提议更换县名，刘伯承考虑，县政府驻地在新集镇，此为一“新”；人民当家做主人，开始了新的生活，此为二“新”。于是，他建议将经扶县改为新县，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赞同。12月30日，经扶县改名为新县，一直沿用至今。

新县现为河南省信阳市管辖，从这里走出了上将许世友、李德生，中将吴先恩、张池明、范朝利、郑维山，以及少将34位。“礼山”不宜用，“大悟”作县名。立

三个『将军县』的特殊由来

□ 胡遵远



煌县和经扶县设立后，蒋介石似乎感觉还不够瘾。在他看来，大别山区到处都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大别山地区山水相邻、人文相近，邻省、邻县交界地区距离城市较远，政令不畅、不便控制。

为“分而治之”，1933年1月，蒋介石下令将湖北省的孝感、黄安、黄陂及河南省的罗山、信阳等县的交界地带，各划出一部分增设一个新的县，并以当地的礼山之名称名为“礼山县”。

1949年4月6日，礼山县全境获得解放。礼山县虽然不像立煌县、经扶县一样以国民党将领名字命名，但也是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反动统治而起的县名，同样不宜沿用。1952年9月，党中央为表彰大悟人民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批准，借红色根据地大悟山之名，将礼山县改名为大悟县，一直沿用至今。

大悟县现为湖北省孝感市管辖，从这里走出了大将徐海东，上将刘华清，中将周志坚、聂凤智、程世才，以及少将31位。以安徽金寨、河南新县、湖北大悟等地为代表的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

（摘自2023年2月23日《中国国防报》）

闻一多治印

□ 张 雨

1938年2月18日，闻一多为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的学生上了最后一课，他鼓励学生说：“中国，不是法兰西，因为，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然后，他便与200多名师生徒步行程3000余里，历时68天，随学校迁至昆明，之后在新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大继续任教。

随着抗战的不断升级，昆明经济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联大教授们的生活急剧恶化。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大名鼎鼎的教授们过着贫穷的生活。据说，当时昆明的乞丐都不找他们要钱，大家都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一次出门，一个乞丐追着闻一多要钱，他无可奈何：“别追了，我是联大教授。”乞丐扭头就走：“你早说嘛，害得我白跟了你半天！”当时，流传的顺口溜：物价一日三跳，有如脱缰野马。由此可知，大教授们穷得叮当乱响。

闻一多全家老少八口人，生活捉襟见肘。为了买来下锅，闻一多把自己穿的一件心爱的皮大衣送进当铺，又把从北平带来的几部古籍卖给学校图书馆。他在家书中无奈地写道：“书籍衣物变卖殆尽，时常在断炊中度日……”

目睹闻一多每况愈下的苦难生活，有的教授提醒他去治印。因为闻一多早年赴美留学时主攻美术，治印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闻一多思考再三，决定挂牌摆摊，刻章治印，贴补家用，留下了“文字是战斗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挣钱养家的工具”的铮铮之语。

闻一多治印，操守极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代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李宗黄请闻一多刻印，许以丰厚酬金，他断然拒绝，并将玉石原样退还。可是，当和平民主运

动组织需要印章，闻一多却分文不取。

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闻一多留下了1400多方印，可见治印之勤，经济之窘迫。闻一多的印作大多收入《闻一多印选》。闻一多的印刀法刚健，疏密有致，有笔有墨，给人以雍容、古朴的美的享受。冯友兰、朱自清、吴晗、华罗庚等都保存有闻一多为他们刻的印，一直视为珍宝。

（摘自2023年2月9日《人民政协报》）



坚决革命的同志董振堂：

□ 邵玉姿



董振堂，1895年出生于河北河间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考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因战功显赫，由排长逐级晋升至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后被国民革命军收编，任26路军第73旅旅长。

1931年，董振堂被调到江西“剿共”。“九一八”事变后，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思想日益倾向革命。同年12月14日和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领第26路军1.7万余官兵举行宁都起义，宣布加入红军，在中国革命史上写